

自媒体的公共信号与高考志愿报录

——基于“张雪峰新闻事件”的研究

范子英 赵欣仪 韦佳妤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 高考志愿报录是高等教育系统的关键一环,也是影响每一位考生的重大决策,而个体的理性决策依赖于真实信息的获取。本文研究了自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对高考志愿报录的影响,运用手工整理的 90 所“双一流”高校 2019—2023 年在各省各专业的录取数据,通过匹配一分一段表转换为可比的录取位次,基于 2023 年“张雪峰新闻学专业评论事件”,系统评估了自媒体的公共信号效应。基于科学细致的量化分析发现:(1)该事件使新闻传播学类最低录取位次平均下降了 15%,且各省的情况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例如山东省的下降幅度超过 30%,福建省则不到 5%;(2)该效应依赖于自媒体的信息传播浓度,短视频观众越多的地区,其体现得越明显;(3)该效应呈现出明显的非对称性,“不推荐”专业的录取位次显著下降,但“推荐”专业的上升效应不明显,说明公共信息在高考志愿报录中所发挥的主要作用为规避风险。为此,应加强高考志愿填报相关言论的审慎管理与引导,实施地区差异化信息监管策略,并提高高考志愿信息市场多元化供给,以科学指导考生填报志愿。

关键词: 自媒体; 高考志愿; 张雪峰新闻事件

一、引言

高考是中国教育体系中最为核心的考试,也是整个教育系统的关键环节。自 1952 年首次实施以来,高考已成为国家选拔和培养人才的重要方式,更是无数学子实现人生理想的重要途径。高考还是体现社会公平的重要载体,促进了社会流动性的提高,增强了全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从 1998 年高校扩招以来至 2023 年,参加高考的人数由 29.9 万人增至 1 342 万人;高校的录取人数也随之快速上升,从 1998 年的 108 万人上升到 2023 年的 1 042 万人,翻了将近 10 倍^①。虽然近年来高校录取方式有了相应的创新,但高考依然是覆盖面最广、影响程度最深的青年考生进入大学的主要途径(许长青等, 2018)。

高考志愿报录是将考生和高校专业进行匹配的核心环节。最终的录取是一系列确定因素和不确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确定的部分包括学生的高考成绩和对专业的认知,不确定部分则是其他学生的报录选择。由于高校专业录取是限额内的分数优先原则,因此考生及家长集体选择行为会给个人及整个均衡结果带来巨大影响。经典的匹配理论认为,信息是决定匹配行为和结果的关键因素(Mortensen, 1986)。考生和家长在高考志愿填报和专业选择过程中,需要对大量的信息进行筛选和甄别,这些信息包括各专业的特点、发展前景、就业市场等方面。这些信息通过影响考生和家长对专业的基本认知,在决定其志愿填报和最终专业选择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于考生和家长而言,获得全面、准确的专业信息是做出理性选择的重要基础。

近年来,基于交互网络和算法的互联网平台蓬勃发展。作为平台企业的两个典型代表,微信的月活用户数量为 13.59 亿,抖音的月活用户数超过 7 亿^②。由于用户体量庞大、穿透力强,大量的个人和

企业开始依托互联网平台构建特色鲜明的自媒体,通过自媒体的内容创作增强客户粘性,形成了垂直领域的分化和聚集。这些自媒体为普通民众的信息获取拓宽了渠道,也就必然会对民众的诸多行为产生直接影响,其中就包括高考专业报录行为。目前,现有文献对高考影响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对传统信息获取方式的分析上(Wiswall & Zafar, 2015; 丁延庆等, 2021; 郭丛斌, 王天骄, 2021; 吴宇川, 丁延庆, 2022; 刘三宝等, 2022),缺少对于互联网时代新型信息来源,尤其是自媒体信息的探讨。

与传统信息相比,自媒体信息有两个不同的特征:一是自媒体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因引发的互动而得到增强。传统媒体的信息传播都是单向的,而自媒体信息可以通过在创作者和用户之间的直接互动而提高用户对信息的接受程度。自媒体——特别是头部自媒体——之间的信息转发与互动会进一步引发用户的关注,从而扩大信息的传播范围和强度。二是自媒体信息在创作过程中带有更加鲜明的主观色彩。与传统新闻媒介侧重于事实本身不同,自媒体为了追求关注度,往往会增加主观解读和主观创造,在互联网的传播与放大机制下,具有造成信息混乱和失真的更大的可能性。既然自媒体也是信息生产和传播的重要载体,其产生的信息就不是私人信息,而属于公共信号,在这一点上它与传统媒体并无差异。

为了研究这种新型的公共信号对高考报录行为的影响,我们从各高校本科招生官方网站手工收集和整理了招录数据,包括 90 余所“双一流”高校 2019—2023 年各省各专业的录取最低分和最高分数据,并通过匹配一分一段表信息获得各专业的最低和最高录取位次,以 2023 年张雪峰新闻学专业评论事件为契机,系统梳理、测度和评估其对高考专业报录的综合影响。本文的研究内容能够为自媒体信息时代下的高等教育管理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

二、文献综述、事件背景与研究假说

(一) 文献综述

目前,关于信息对考生选择和高考报录影响的文献还主要停留在对传统的信息获取方式的分析上。第一类研究讨论了实验中的直接信息干预对专业选择的影响。Wiswall & Zafar(2015)通过对纽约大学的本科生进行了多轮实验,通过直接的信息干预,考察学生在信息干预前后关于专业看法的改变。丁延庆等人(2021)以“各专业大类对应本科毕业生起薪”为主要内容进行信息干预,考察其对考生专业选择行为的影响,发现信息干预对于弱势考生专业选择的意愿和行为产生了较为显著的影响,提高了此类考生被录取到经济回报较高专业的概率。第二类研究主要对政府发布的教育信息进行考察。郭丛斌和王天骄(2021)基于 2016—2020 年全国高考录取数据和教育部学科评估结果披露信息,考察公开信息对各学科本科生源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学科评估结果的披露显著提高了相应本科生源的录取最低分,但对录取平均分的影响不显著。吴宇川和丁延庆(2022)基于 2016、2018 和 2019 年山东省高考录取面板数据,主要考察了“双一流”建设名单公布的信号机制,发现入选“双一流”建设高校能够提升本校专业生源质量,而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的提升效应在不同学科中存在差异性。第三类研究则聚焦高校招生宣传信息推送的影响。刘三宝等人(2022)基于武汉地区 1886 份高校新生入学调查数据,发现高校的网络招生宣传信息能够有效降低学生在选专业时的“盲选”与“错选”问题,提升了生源的专业匹配度。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集中探讨了信息直接干预以及政府与高等教育机构发布的信息对高考志愿报录情况的影响,然而,针对互联网时代自媒体信息对高考志愿报录情况的系统性研究还十分匮乏。与传统信息相比,自媒体信息与受众的互动性更强,其内容也更加自由和多元,不仅提高了其传播和渗透能力,同时也增加了导致信息混乱和失真的可能性。目前,自媒体愈发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其对考生的志愿填报行为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在不同群体之间有什么差异?不同内容的自媒体信息

产生的影响有何差别?这些问题亟待深入研究。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三方面:(1)研究视角相对独特。本文重点考察自媒体信息传播对高考录取结果的影响,与既有文献存在显著不同。(2)研究方法更为严谨。本文在回归分析中,在控制了年份、专业、学校、生源地和科类固定效应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了科类—年份、生源地—年份和生源地—科类联合固定效应,对因果效应的识别更加准确。(3)研究结论具有现实意义。从单个学科和专业来看,张雪峰事件的影响十分显著,有必要对其在国家层面的人才培养规划方面所带来的影响进行合理引导和管理。

(二) 事件背景与研究假说

1. 事件背景

为了更清晰地了解张雪峰新闻学专业评论事件(简称“张雪峰事件”),我们对该事件的发生、演变、传播和直观影响进行了系统梳理。2023年5月15日,教育界知名博主张雪峰在官方认证的微信视频号“研途考研张老师课堂”中发布了一条短视频。短视频中张雪峰对一名考生想报考新闻学的情況是这样回应的:“理科590报新闻?你会崩溃的。”“别报新闻,从中国本科专业目录里面闭着眼睛摸一个都比新闻好。”“如果我是家长,孩子非要报新闻学,我一定会把他打晕,然后给他报个别的。”这条短视频的原始出处为张雪峰2022年12月的一次直播,在直播时并未引起广泛关注,在2023年5月份视频发布时,一开始也未在网络上引发大范围传播。

真正引发全网传播和讨论是在一个月之后。2023年6月,新闻传播学界的学者通过网络平台对张雪峰的新闻学言论进行了批判性评论,该评论认为张雪峰“自己吃着传播的饭,却在砸着传播的锅,何其荒谬”。对此,张雪峰亦通过公开渠道进行了回应。这一网络冲突事件随之引发热议。同时,张雪峰的新闻学评价言论在网络平台上迅速扩散,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和激烈讨论。如图1所示,百度和抖音关键词搜索指数都表明,“张雪峰”关键词自2023年6月初有所起伏,到6月中下旬跳涨至高位,说明该事件引发了人们的热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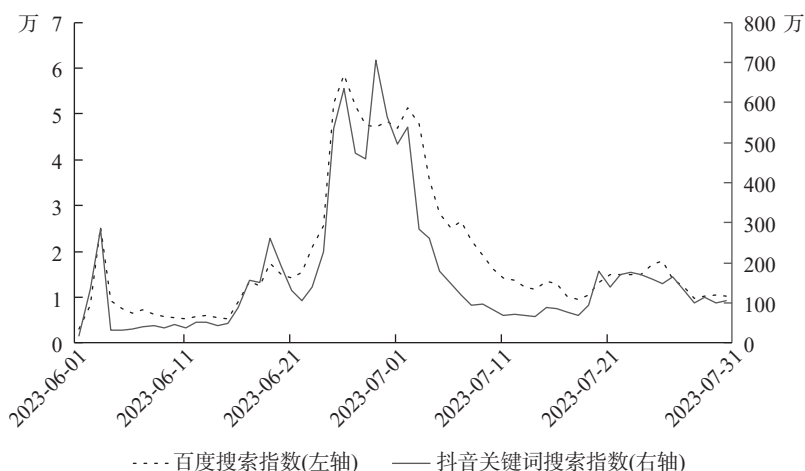


图1 张雪峰关键词热度指数

由于观点犀利且正值高考报录的关键时期,该事件成为全网的舆论焦点。在该事件的影响之下,张雪峰关于高考专业报录的一些其他视频和观点也被重新二次传播。

数据表明,这一负面舆论确实会对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报录产生影响。为了直观呈现这种影响,下面以新闻传播学类招生规模较大的中国传媒大学为观察对象。图2和图3展示了中国传媒大学2022年和2023年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在各省招生的最低录取位次,通过在两年之间的对比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其影响幅度。观察图2和图3可以发现,在大部分省份,新闻传播学类2023年的录取位次均

有所下降^③,说明中国传媒大学的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录取情况在2023年受到了负面冲击。

虽然图2和图3直观反映出中国传媒大学2023年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录取情况呈现出显著的下滑态势,然而,仅通过将位次数据进行直接加总并计算其平均值的方法,并不能有效揭示其受到冲击的效应大小。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直接进行比较的方式将受到不同年份的报录特征的影响,因此需要分离时间趋势的干扰;二是不同高校、专业、省份的位次分布也有其独特的特点,需要将这些干扰因素剔除。为了考察张雪峰事件带来的冲击是否普遍存在于其他高校,冲击效应的平均强度如何,以及对不同群体的异质性影响如何,就需要更加全面的数据和更加科学的研究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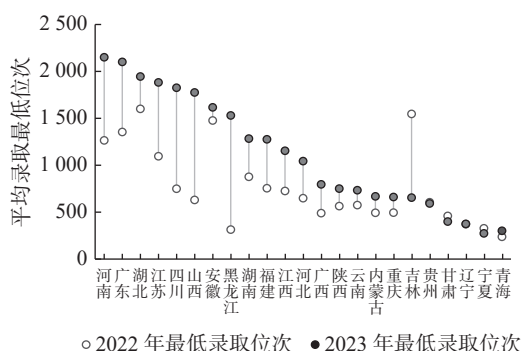


图2 新传专业在各省的录取位次（文史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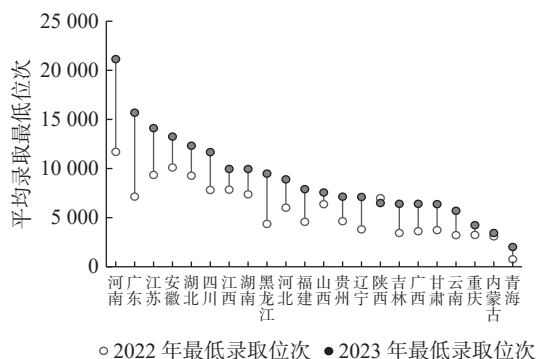


图3 新传专业在各省的录取位次（理工类）

注:图2和图3的计算方式为,保留各生源地在2022年和2023年都有最低录取位次信息的新闻传播学类具体专业,然后在生源地、考试科类(文理)和新闻传播学类内部计算最低录取位次平均值。图2和图3分别根据各省份2023年新闻传播学类平均最低录取位次的大小进行排序。图中不包含全省考生一起排名的综合改革的省份。

2. 研究假说

张雪峰新闻学专业评论事件对相关专业的报录情况的影响依赖于两个关键条件:一是该事件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二是考生在志愿填报过程中对此类信息做出了相应的反应。

张雪峰事件可以被视作互联网时代下议程设置的产物。议程设置理论是传播学中的重要理论之一。该理论指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播媒介能够对不同议题赋予不同程度的显著性,不仅能引发公众对特定议题的关注,也会影响他们对这些议题重要性的评价(McCombs & Shaw, 1972),即“新闻媒体在告诉人们怎么想这一方面可能并不成功,但在告诉人们想什么的方面却异常成功”(Cohen, 1963, p. 13)。目前,随着社会的演进和技术的创新,网络媒体正在逐渐取代传统媒体,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王国华,李文娟, 2019)。在互联网普及的背景下,议程设置的过程呈现出新的特征,张雪峰言论受到空前关注正是该背景下议程设置理论的重要体现。一方面,在互联网背景下,议程设置的起点多样化使得张雪峰的言论被设置为公共议程成为可能。在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过程中,新闻媒介作为议程设置的单一主体,其对公众议程的影响是单向的,是自上而下的(高亮春, 2011)。而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催生出一个“人人都能生产信息”的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隋岩, 2018)。新媒介技术的发展降低了受众使用媒介进入媒体的门槛。在互联网中,个体和社群开始发挥巨大的作用,个人议程在很多情况下成为议程设置的激发点和归宿点(高亮春, 2011)。在此背景下,张雪峰通过自媒体所发表的言论,完全具备了成为议程设置起点的条件。另一方面,互联网在议程设置的具体过程中起到了显著的催化剂作用,使得张雪峰事件具有突发性、猛烈性。首先,在互联网传播背景下,人们主动接收信息的能力大大增强,随之而来的是整个产业环境和传播模式都以用户(消费者)的需求为主导(隋岩, 2018)。张雪峰事件在高考节点附近爆发,正是信息投放者刻意迎合彼时信息消费者的需求所导致的结果。其次,在互联网环境中,信息交流具有交互性、即时性、多样性、

广泛性等特点,使传播更加快捷,大大缩短了议程设置的时间,同时也会放大议题的受关注度(马志浩,葛进平,2013)。这种议程设置的特点使得张雪峰事件的爆发具有突发性,能引发公众的广泛讨论。

张雪峰事件的爆发构成了一个显著的公共信号,而其之所以能够对考生的行为产生影响,主要在于信息的鲜明度以及市场对于信息的需求度两方面。一方面,个体对于公共信号做出一致行动的前提在于其对于该信号的语义有共同的理解,即信号明确可解读(Duffy & Fisher, 2005)。例如,“没有技术壁垒的专业没有前途”对于考生的影响可能并不明确,原因在于考生对于各类专业的认知不一致,从而带来决策的分散化。而在张雪峰事件的相关信息中,最主要的内容是其“不推荐新闻学”的言论,具有明确的指向性,从而能够引起考生较为一致的共同行动。另一方面,从高考志愿填报信息市场需求来看,高考志愿填报相关的具体信息至今依旧是相对稀缺的(王毅杰,李欣悦,2024)。尽管高校和各省教育考试院提供的志愿报考的历史信息具有参考价值,但其本身往往存在着复杂性与不明确性,不利于判断。首先,专业种类繁多,通过汇总历史信息来了解每个专业的特色和发展前景颇为困难;其次,部分招生宣传信息往往经过策略性筛选,目的在于吸引高分生源的注意,这进一步增加了考生对于有用信息的分辨难度。因此,考生对于清晰明确的专业志愿填报的相关信息具有较高的需求度。

上述分析表明,张雪峰事件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并且考生在志愿填报过程中会对此类信息做出相应反应,从而影响其志愿填报行为。基于此,本文提出有待检验的假说1:

假说1:张雪峰新闻学专业评论事件会降低新闻传播学类的录取位次和录取分数。

在张雪峰新闻学事件中,不同考生对事件信息的接收程度并不一致,这会导致他们对该事件反应的强度产生差异。由于所处环境和自身需求具有异质性,考生不仅客观上暴露在不同信息浓度的环境中,主观上也会对是否接收信息、接收多少信息进行选择。

在客观环境方面,考生能够接收到多少张雪峰信息^④依赖于其所处的环境与禀赋条件。张雪峰信息从发酵、传播到最终被个体接收的整个过程主要依赖于互联网媒介,而互联网的使用在不同个体之间还存在着差异。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尚不平衡,个体间经济条件差异较为明显,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考生对于新型信息媒介的接触能力有限(程名望,张家平,2019;鲁元平,王军鹏,2020)。同时,各地区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新型媒介应用程度存在地域特征(王鹏,岑聪,2022),导致不同地区个体在使用新型媒介方面的环境呈现出系统性的差异。这些差异的存在使得考生接收张雪峰信息的能力不同,从而在客观上处于不同的信息浓度中。

在主观选择方面,考生也会根据自身的需求对张雪峰信息进行选择。即使所有考生及其家庭都与志愿填报高度相关,但是他们对该类信息的关注度存在差异。由于习俗、观念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家庭对于下一代的培养方式的选择以及学习情况的重视程度不同(姚远等,2024)。同时,不同地区的高考竞争程度也不一致(吴斌珍,钟笑寒,2012)。这些都会导致个体对高考志愿信息的需求程度存在差异。这种需求差异导致了张雪峰信息的选择效应,一部分人会更加主动地去接收更多的信息,从而主观上导致个体处于不同的张雪峰信息浓度中。

考生在信息浓度较高的情境下,接收到明确信息的可能性增加,从而更可能受到特定事件的显著影响。基于上述两方面,本文提出有待检验的假说2:

假说2:不同个体接收到张雪峰的信息浓度存在差异,在信息浓度较高的地区,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报录情况将受到更大的负面影响。

尽管张雪峰事件中最为突出的信息是他对新闻专业的负面评价,但随着事件热度上升,他对其他专业的评价也会受到广泛关注。这些言论经过加工与传播后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张雪峰不推荐的专业”言论,一类是“张雪峰推荐的专业”言论^⑤。这些言论可以分别被视为负向信号和正向信号,负向信号与正向信号对考生产生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

一方面,张雪峰信息的两种公共信号与私人信号的冲突是不对称的。在存在公共信号的情况下,个体的最终行为是公共信号与私人信号共同作用的结果(Morris & Shin, 2002)。已有研究表明,公共信号可能会对个体的私人信号产生干扰效应,且干扰程度在个体间是不一致的(Heinemann & Moradi, 2018; Fehr, et al., 2019)。在张雪峰事件中,其负向信号,即他对某些专业的“不推荐”言论,会与那些原本有意选择这些专业的个体的私人信号产生明显冲突;相反,对于那些正向信号,即他对某些专业的“推荐”言论,使原本有意选择这些专业的个体的决策在此基础上不会发生改变。此外,对于原本打算选择其他专业的个体,公共信号与私人信号的关联性不高,对初始决策产生的影响也相对较小。

另一方面,互联网中的信息质量良莠不齐。个体在接触与处理互联网中传播的公开信息时,往往会有保留地进行接受与采纳,个体这种风险规避的态度也会影响正向信号和负向信号所产生效应的大小。对于负向信号中所包含的不推荐专业的信息,考生及家庭出于风险规避的心理,会避免选择这些专业以规避潜在的不利后果,所以导致这类专业报录情况恶化。而对于正向信号中所蕴含的推荐专业的信息,考生和家庭对此类网络信息往往保持审慎的态度,不会轻易地选择张雪峰所推荐的专业,因此这类专业的报录情况受到的影响较小。

综合上述两方面的分析可以得出,考生对于张雪峰不推荐的专业的反应强烈,而对于张雪峰推荐专业的反应不足。据此,本文提出有待检验的假说3:

假说3: 张雪峰的言论对其“推荐”与“不推荐”的专业产生了显著的非对称影响,对不推荐专业的报录情况的负面影响较为显著,而对推荐专业的正面影响则相对较小。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为了提高研究数据内部的可比性,本文将研究对象集中于“双一流”建设高校。“双一流”高校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褚照锋, 2017),这些高校的发展和考生都具有高度的相似性(马莉萍等, 2021)。本文所使用的数据集是90所“双一流”建设高校2019—2023年在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各专业的录取数据,原始样本量为349 000条^⑥。

各高校对2023年度招录数据的公开进程并不一致。截至2024年4月13日,共计90所“双一流”高校在官网中公开了2023年各专业的录取数据。鉴于对张雪峰事件影响的考察完全依赖于2023年数据的公开情况,因此本文基于这90所“双一流”高校的专业录取数据进行研究与分析。本文所使用的样本能够支持对本文问题的分析:首先,样本覆盖了现阶段147所双一流高校中61%的高校,代表性较高;其次,这些高校的地理与类型分布较为均匀,符合数据的结构要求;最后,各学校录取数据的公开时间与公开方式均具有随机性,保障了样本的非选择性。

本文采取手工收集的方法,从各高校本科招生官方网站的历年招生信息中收集专业录取分数数据。和其他收集渠道相比,从官网直接收集数据有以下优点:首先,作为高校公开招生信息的直接平台,其数据质量相对较高;其次,数据公开范围较为全面,大部分学校都会公开所有生源地的录取信息,除了专业录取最低分之外,部分高校还提供了录取最高分,为多角度探讨录取情况受到的影响提供材料支撑;再者,官方平台的招生信息对各类招生专业的所属类别进行了详细的标注,便于对各类特殊计划、各类批次等录取信息进行区分。鉴于部分高校较早年份的招生信息存在缺失,我们从“中国教育在线”网站进行了数据补充。此外,我们还从各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和各省历年的高考志愿填报书中收集了各省历年的一分一段表,以获取各专业录取位次信息。

(二) 数据处理

本文的核心指标包括各专业的最低录取位次、最高录取位次、录取最低分和最高分,考虑到各省

考生规模的影响,所有变量均取对数使用。其中最低录取位次为本文的核心指标。最低录取位次能够灵敏地捕捉到生源质量的变化,被广泛地应用于学术研究中(马莉萍等, 2021; 金红昊, 张文杰, 2021; 吴宇川等, 2023; 李筱璐等, 2024);最高录取位次反映了排名靠前生源的变动情况。同时,用各专业的录取分数来度量生源质量的方式也被广泛使用(Bai, et al., 2014; 康乐等, 2021; 刘瑞明等, 2021),因此使用录取最低分和最高分进行进一步分析。

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23),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有93个门类专业类^⑦,其下总共有具体专业792个^⑧。我们根据这些专业名称信息逐一每一条招生信息进行匹配,在同一学校一年份一生源地一科类一门类专业类内的样本中,取最高分的最大值作为该门类专业类的最高分,取最低分的最小值作为最低分,由此得到了门类专业类层面的录取分数数据。

将专业加总至门类专业类层面主要出于以下考量:第一,在专业分数公开方面,各高校和不同学科的公开层级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在90所高校中,仅有7所高校完全按照具体专业的方式公开了其录取分数,其余学校的一部分学科则仅公开门类专业层级的录取分数^⑨。若不进行加总,则会导致各专业之间的数据不可比。第二,同一门类专业类下的具体专业具有相似的特征,选择这些专业的考生也会呈现出相似的填报规律,加总分析符合逻辑一致性。第三,本文旨在研究张雪峰新闻学专业评论事件所产生的影响,鉴于新闻传播学类的大多数专业均与新闻传播紧密相关,该类别内的专业均会受到事件的影响,因此,加总至门类专业类层面分析具有合理性。

为了使数据具有更好的可比性,本文删除了一些特殊性质的专业样本(郭丛斌, 王天骄, 2021):(1)提前批、专项计划、预科、师范、内高班等录取性质特殊的样本以及中外合作、实验班样本;(2)体育类和艺术类别的招生信息;(3)少量第二批次招生的样本。以上这些被删除的样本与其他样本的录取分数均不可比。

由于不同年份、不同省份的考试内容不同,录取分数无法跨省、跨年直接对比,需要将其转换为可比的录取位次。我们从各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和各省历年的高考志愿填报书中收集了各省历年的一分一段表,并将各门类专业类的录取最低分与最高分与所对应的一分一段表进行匹配,得到最低录取位次和录取最高位次。在后续分析中,主要使用最低录取位次进行分析。

经过数据整理和加总后的样本量为185934条,样本覆盖了86个不同的门类专业类,在专业维度上具有全面性^⑩。

(三) 识别策略

本文主要考察张雪峰事件对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录取产生的影响。由于张雪峰事件的爆发具有随机性,可以视为准自然实验。其中,受到冲击的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是处理组,其他专业则为控制组。对此,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构建如下含有多维固定效应的计量模型对该事件的效应进行识别:

$$R_{upsit} = \beta_0 + \beta_1 treat_i \times post_t + \gamma \times X_{upsit} + \tau_i + \rho_t + \alpha_u + \theta_p + \delta_s + \varepsilon_{upsit} \quad (1)$$

其中, R 为被解释变量,即 u 学校在 p 省份 s 考试科类的 i 专业在 t 年份的最低(高)录取位次或录取最低(高)分数的对数值。 $treat$ 为“是否为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虚拟变量,该专业为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取1,反之取0。 $post$ 为“是否在受到处理年份之后”的虚拟变量,年份为2023年取1,反之则为0。 $treat \times post$ 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即新闻传播学类虚拟变量与2023年虚拟变量的交乘项,是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并且年份为2023年的赋值为1,否则为零,其回归系数 β_1 能够反映张雪峰事件对于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报录情况的影响。 X 是一系列控制变量。

为了控制住招生计划数变动对位次和分数的影响,我们从各学校本科招生官网和中国教育在线网站获得各专业的招生计划数,根据专业的名称、科类、特殊招生类型等信息与历年的招生分数进行匹配,最终加总至门类专业类层面并取对数。本文还控制住了学校层级和学校声誉方面的因素对录取情

况产生的影响(刘瑞明等, 2021)。多项研究表明,“985 工程”“211 工程”等重点建设政策对于高校发展和生源质量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栗晓红, 张莉娟, 2014; 刘强, 2015; 鲍威等, 2017; 哈巍, 占雯燕, 2018; 王金龙, 邹志辉, 2021), 因此在回归中还加入了是否入选“985”平台和“211”平台的虚拟变量。

此外, 为了分离出较为干净的张雪峰事件效应, 我们还控制了一系列固定效应。首先, 依据惯例, 控制专业和年份双向固定效应 τ_i 和 ρ_t 以排除专业间不同特征以及不同年份特征的影响; 其次, 考虑到不同学校在学校层次、发展特征和招生规模等方面存在系统性差异, 本文还加入学校固定效应 α_u ; 同时, 不同生源地在考试方式、分数赋值、考生人数方面存在分异, 为了增强生源地之间的可比性, 我们也控制了生源地固定效应 θ_p ; 最后, 文科、理科或文理不分科的考生在高考报录上存在不同特征, 不能直接比较, 因此我们加入科类固定效应 δ_s 来控制住这些影响。

由于单一维度的固定效应难以控制住繁多的影响因素, 因此我们在模型(2)中进一步加入生源地—年份、科类—年份、生源地—科类联合固定效应:

$$R_{upsit} = \beta_0 + \beta_1 treat_i \times post_t + \gamma \times X_{upsit} + \tau_i + \alpha_u + \mu_{pt} + \sigma_{st} + \omega_{ps} + \varepsilon_{upsit} \quad (2)$$

其中, μ_{pt} 是生源地—年份联合固定效应, σ_{st} 是科类—年份联合固定效应, ω_{ps} 是生源地—科类联合固定效应。首先, 由于每个省份在不同年份的题目难度和参加高考的人数存在差异, 样本期中部分省份还进行了新高考改革, 同一省份在不同年份间的指标无法直接比较, 为此, 我们控制住生源地—年份联合固定效应以排除这些因素的干扰。其次, 文科、理科或者不分文理的考试方式在不同年份中也会存在波动和趋势, 因此我们控制住科类—年份联合固定效应可降低这些因素的干扰。此外, 同一省份的不同科类也存在着不同的特征。本文考察的时间区间内涉及新高考改革, 有些省份从文理分科变为了不分科类, 同一省份中, 综合改革和文理分科无法直接比较, 为此, 我们加入生源地—科类联合固定效应以控制住这些因素的影响。在控制住高维联合固定效应后, 相应的单维度固定效应则会自动失效, 其效应会含在联合固定效应中, 因此模型(2)中不再包含省份、年份、科类固定效应。

在上述回归模型中, 本文关注的核心系数为 β_1 , 反映了张雪峰事件对新闻传播类专业录取情况的因果效应大小。当被解释变量 R 取位次的对数值时, 系数的含义为张雪峰事件造成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录取位次变化的比率, 系数为正说明录取位次的数值越大, 按照通常的习惯称作“录取位次下降”, 反之亦然; 当 R 取分数的对数值时, 系数的含义则为张雪峰事件影响新闻传播学类录取分数变化的比率, 系数为负说明录取分数的越低, 即“录取分数下降”, 反之亦然。

四、实证研究结果

(一) 基准结果及解释

表1考察了张雪峰事件对于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最低录取位次和最低分的影响。第(1)—(3)列考察张雪峰言论冲击对新闻传播学类最低录取位次的影响。第(1)列加入控制变量并使用双向固定效应, 以排除不同年份趋势和专业特点对因果造成的干扰, 结果表现出显著的负向效应。第(2)列加入学校、生源地和科类固定效应进行回归, 由于“是985学校”和“是211学校”变量的效应会被学校固定效应所吸收, 因此不再加入这两个变量。第(3)列进一步加入生源地—年份、科类—年份和生源地—科类联合固定效应以得到更为严格的因果效应。结果发现, 在控制住生源地随年份波动的因素、科类随年份波动的因素和各生源地不同科类的特征后, 张雪峰新闻事件冲击使新闻传播学类最低录取位次下降了15.1%。第(4)—(6)列以同样的思路对录取最低分进行分析, 发现新闻传播学类录取最低分下降了0.9%, 以高考全国卷为例, 相当于录取最低分平均下降了6.75分。表1的结果综合说明, 张雪峰事件对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录取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由此验证了假说1。

通过将双重差分项的效应进行拆分, 我们可以更加直观地观察到各个生源地的考生受到张雪峰事件冲击的大小。图4中绘制出了各生源地省份的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最低录取位次的回归系数以及

95% 置信区间。其中,山东省受到的冲击最大,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最低录取位次下降幅度超过 30%;山西、海南、贵州、广西、上海、内蒙古、宁夏、天津、辽宁的下降幅度超过 20%;河北、四川、浙江、黑龙江、安徽、陕西、广东、河南、重庆、湖北、北京下降幅度超 10%;仅有云南、甘肃、江苏、湖南、吉林、江西、福建的下降幅度低于 10%。可以看出,虽然各生源地都受到了张雪峰事件的较大负面影响,但是各省之间也呈现出明显的分化。

表 1 张雪峰事件对新闻传播学类最低录取位次和最低分的影响

变量	(1)	(2)	(3)	(4)	(5)	(6)
	ln最低位次			ln最低分		
新闻传播学类×2023	0.202*** (0.026)	0.161*** (0.015)	0.151*** (0.014)	-0.012*** (0.003)	-0.013*** (0.002)	-0.009*** (0.001)
ln招生计划数	0.120*** (0.021)	0.062*** (0.005)	0.061*** (0.005)	-0.005* (0.003)	-0.005*** (0.001)	-0.005*** (0.001)
是985学校	-0.917*** (0.023)			0.049*** (0.003)		
是211学校	-0.531*** (0.023)			0.030*** (0.002)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专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学校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生源地固定效应		是			是	
科类固定效应		是			是	
生源地—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科类—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生源地—科类固定效应			是			是
N	185 934	185 934	185 934	185 934	185 934	185 934
R ²	0.398	0.933	0.934	0.111	0.625	0.907

注: *、**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中为生源地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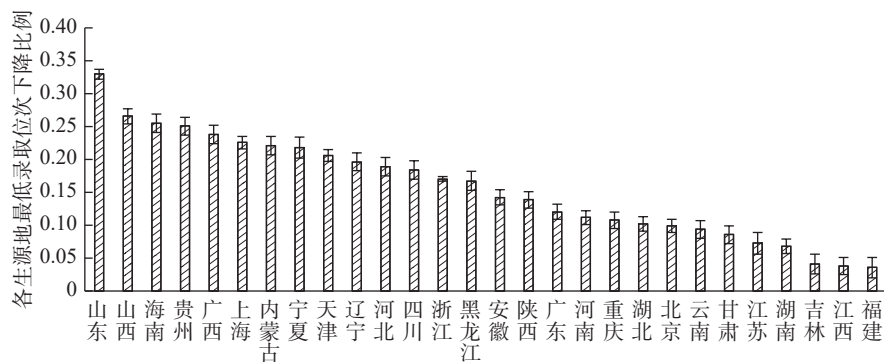


图 4 各生源地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最低录取位次下降比例

根据前文分析,张雪峰事件通过议程设置引起广泛关注,考生和家长在网络环境中接收到张雪峰言论的信息,并基于这些信息做出反应。在此渠道的作用下,接收到张雪峰新闻学言论的信息越多,处于高信息浓度环境中的个体的反应会更强烈。

张雪峰本人的观众群体十分庞大。在 2023 年,张雪峰主要利用抖音这一社交媒体平台进行直播活动,对高考报名的相关事项进行解读,并与观众进行实时连麦互动,解答观众在志愿填报过程中遇到

的疑问并提出报名建议。在当年志愿填报期间,其直播间的同时在线观看人数一度达到了十万人以上。此外,张雪峰也通过该平台发布了与高考报录相关的大量短视频内容。因此,在张雪峰新闻学专业评论事件爆发后,最先受到信息冲击的是对他高度关注的观众群体。

巨量星图平台是便于广告主和抖音等平台达人进行内容交易的服务平台,该平台汇集了抖音创作者的详尽信息,其中包含了创作者的观众信息,根据观众所观看内容类型的不同,可以进一步细分为直播和短视频观众信息。据此,我们从中收集了张雪峰官方抖音账号的各省份观众占比数据,该数据记录了各省份观众在张雪峰全部观众群体中所占的比例^⑪。因此,我们可以用观众占比数据来探讨张雪峰信息浓度在地区间的不同分布对报录效应的影响。

然而,直接使用各省份的观众占比数据可能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张雪峰在某一省份的观众数量庞大可能是该地区人口基数大所导致的,并不能直接反映出个体所面临的信息浓度。图5显示,张雪峰的抖音观众数和各省的常住人口数高度相关。从人均信息接收的角度出发,依据人口规模将原始指标进行调整能够更好地反映出各省份个体所接收到的张雪峰信息浓度强弱。因此,我们将各省的观众占比与2023年的常住人口数占比进行比照^⑫,得到处理后的第1类观众占比指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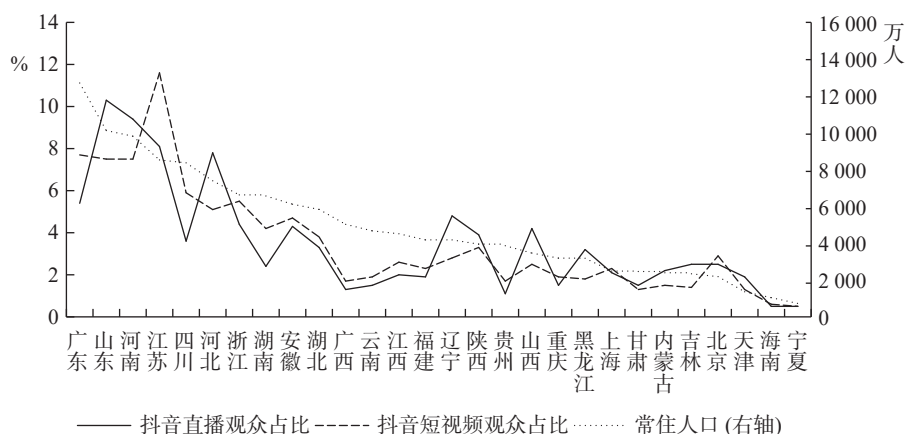


图5 抖音观众占比与人口的关系

其次,是否要观看张雪峰的直播和视频是个人的选择,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也会影响到自身所处的信息浓度。具体而言,各省的抖音用户数反映了各省使用抖音平台的习惯情况,如果将该省张雪峰观众数量与该省抖音用户数进行对比,比值大小能够反映出当地用户在排除人口因素和抖音平台的使用习惯后对于张雪峰信息需求的强弱。比值越大,则说明该省的个体对张雪峰信息的选择性较强,会主动接收更多的张雪峰信息从而处于更强的信息浓度中。因此,本文从个体主观选择角度出发,进一步将观众占比跟各省的抖音用户占比进行比照^⑬,作为处理后的第2类观众占比指标。

表2综合考察了信息浓度对张雪峰事件结果的影响。第(1)—(4)列将第1类观众占比指标作为分组依据,将高于中位数的样本划分为信息浓度较高的组,反之为信息浓度较低的组,进行分组回归。结果发现,不论是以短视频观众还是直播观众作为划分依据,信息浓度较高的组别受到的冲击更大,最低录取位次下降得更严重。第(5)—(8)列则依据第2类观众占比指标分组进行回归,结果依旧表明,接收到信息更多的组别受到的冲击更大。假说2得到初步验证。

虽然张雪峰是教育领域的头部博主,但是其本身的观众群体还无法反映出所有考生和家长受到的冲击。此次事件作为一次引发社会公众关注的公共传播事件,影响极为广泛,相关信息在各大网络平台上都得以呈现。不仅关注了张雪峰的个体会直接受到冲击,其他考生和家长在上网的过程中,也会不同程度地接收到张雪峰言论的相关信息。因此,采用张雪峰观众数作为信息浓度的分组依据虽然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不同群体接收张雪峰信息浓度的差异,但还需进一步从舆论广泛分布的视角来考察不同群体所处的信息浓度,并进行检验。

表 2 张雪峰事件对新闻传播学类录取情况的影响: 信息浓度差异 I

变量	(1)	(2)	(3)	(4)	(5)	(6)	(7)	(8)
	ln最低位次							
	直播观众占比1		短视频观众占比1		直播观众占比2		短视频观众占比2	
	高	低	高	低	高	低	高	低
新闻传播学类×2023	0.177*** (0.018)	0.126*** (0.019)	0.181*** (0.017)	0.121*** (0.020)	0.182*** (0.020)	0.124*** (0.018)	0.185*** (0.020)	0.123*** (0.01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各类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各类联合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92 760	93 174	93 055	92 879	88 360	97 574	84 955	100 979
R ²	0.934	0.937	0.935	0.933	0.932	0.939	0.932	0.939

注:①*、**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为生源地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②“直播观众占比1”“短视频观众占比1”是将各省的观众占比比上各省的常住人口数占比得到的指标;“直播观众占比2”“短视频观众占比2”是将观众占比比上各省的抖音用户占比得到的指标。

百度是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早期便着手进行信息汇总工作,对于网络热门词汇的资讯情况、搜索情况的统计也较为全面,具备一定的精准度和权威性。其中常见的指标有百度资讯指数和百度搜索指数^④,皆已被广泛地应用在学术研究领域(施炳展,金祥义,2019;吴宇川等,2023)。

百度资讯指数衡量了新闻资讯在互联网上对特定关键词的关注及报道程度和持续变化,由网民的阅读、评论、转发、点赞、不喜欢等行为的数量加权求和得到,可以反映出特定关键词在一个地区的曝光程度,从而衡量出某一地区群体所处的信息浓度。我们在百度指数平台中获取了关键词“张雪峰”的百度资讯指数。同时,由于张雪峰信息冲击影响的是高考考生的志愿填报行为,我们还需要定义张雪峰信息产生影响的时间窗口,以考察特定时间段内张雪峰信息浓度的影响。鉴于各省份报名录取工作时间安排并不一致,因此我们查询了2023年各省的高考报名时间日程并纳入指标处理。具体而言,本文所使用的学校样本都是双一流高校,影响到的学生多数都是本科一批的学生,因此我们查询了各省份2023年本科一批报名系统关闭时间,将高考开始(6月7日)到本科一批报名系统关闭这一区间作为时间窗口,并收集这时间一窗口内的百度资讯指数平均值。以与前文同样的处理思路,我们将百度资讯指数平均值除以2023年的常住人口数,按照中位数划分为信息浓度较高的组和信息浓度较低的组,并进行分组回归。结果如表3中的(1)—(2)列所示,信息浓度较高的组别受到的负面冲击更大。

进一步地,可以依据百度搜索指数从个人意愿的角度测度信息浓度。百度搜索指数反映了互联网用户对关键词搜索关注程度及持续变化情况,以网民在百度的搜索量为计算依据。个体基于自身的需求,选择性地接收张雪峰的言论信息,从而处于不同的信息浓度中,这种选择性行为在数据层面上即表现为搜索指数的波动。与上述资讯指数的处理方式类似,我们将各省搜索指数在6月7日至本科一批报名系统关闭这一时间段的均值进行人均化处理并依据中位数分组进行回归,结果见表3第(3)—(4)列。结果依旧显示,信息浓度较高的组别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大。表2至表3的回归结果一致表明,信息浓度高的群体受到了更强烈的负面冲击,由此验证了假说2。

(二) 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

采用双重差分法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即在控制住其他混淆因素的影响之后,处

理组和控制组没有明显的事前差异,即该回归结果不是由处理组的特殊趋势所导致的。图 6 和图 7 以张雪峰事件发生前一年(2022 年)为基期,使用事件研究法分别考察了张雪峰冲击对最低录取位次和最低分的动态效应。结果显示,在控制住各类混淆因素后,无论是采用录取分数线最低位次还是最低分来衡量高考录取情况,在 2023 年之前的历年回归系数在 0 附近波动,且均不显著;而 2023 年的结果则发生了显著的跳跃,这说明前文的回归结果并非由趋势导致,而是确实受到了张雪峰事件的影响。

表 3 张雪峰事件对新闻传播学类录取情况的影响:信息浓度差异 II

变量	(1)	(2)	(3)	(4)
	ln最低位次			
	资讯指数		搜索指数	
	高	低	高	低
新闻传播学类×2023	0.174*** (0.019)	0.128*** (0.019)	0.187*** (0.024)	0.125*** (0.01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各类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各类联合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92 140	93 794	79 912	106 022
R ²	0.934	0.936	0.936	0.935

注:①*、**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为生源地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②“资讯指数”“搜索指数”为各省6月7日到本科一批报名系统关闭这一时间区间内的百度资讯指数/百度搜索指数均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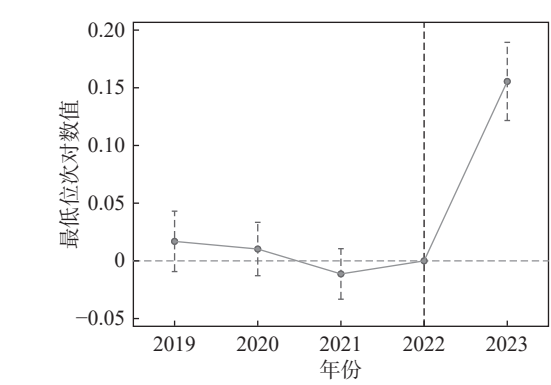


图 6 平行趋势检验:录取最低位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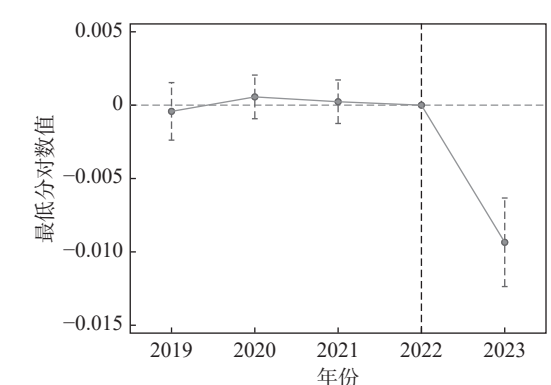


图 7 平行趋势检验:录取最低分

2. 更换被解释变量

最高录取位次和最高分同样是衡量专业录取情况的重要指标。张雪峰事件对新闻传播学类专业造成了负面影响,那么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优质生源的流失,即最高分和最高录取位次应该同样受到了负面冲击。然而,并非所有学校在每一年都公开最高分的数据,为了保证样本的平衡性,我们保留 2019—2023 年这五年间都一直公开最高分数据的学校样本进行回归。表 4 第(1)—(2)列的结果显示,最高录取位次下降了 15%,最高分下降了 0.8%,对比表 1 和表 4 的结果,可以发现两者在影响程度上较为一致,说明在更换指标后,张雪峰事件对新闻传播学类高考报录情况的负面影响依旧稳健。

3. 更换数据集

为了使各门类之间的数据具有更好的可比性,从而得到更精准的估计系数,本文基准回归所使用的数据集是剔除掉提前批、专项计划、预科、师范、内高班等录取性质特殊的样本以及中外合作、实验班样本后进行加总的门类专业类数据集。为进一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下面更换数据处理的方式以形

成新的数据集,对上述回归结果进行重新检验。具体而言,在数据加总的过程中,在不剔除任何特殊样本的情况下,将所有样本重新进行加总得到新的数据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4 第(3)—(4)列,表明张雪峰事件的负面影响依旧显著存在。

表 4 稳健性检验: 更换被解释变量与更换数据集

变量	(1)	(2)	(3)	(4)
	更换被解释变量		更换数据集	
	ln最高位次	ln最高分	ln最低位次	ln最低分
新闻传播学类×2023	0.153*** (0.013)	-0.008*** (0.001)	0.161*** (0.012)	-0.010*** (0.00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各类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各类联合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72 326	72 326	205 382	205 382
R ²	0.927	0.928	0.912	0.888

注: *、**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中为生源地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三) 异质性效应

相较于经济活力低的地区,经济活力较高地区的家庭由于信息获取能力更强(丁延庆等, 2021), 因此更容易受到张雪峰言论的影响。基于此, 本文使用各生源地初期(2019 年)的人均新注册企业数衡量地区经济活力, 并根据中位数划分高活力组和低活力组, 比较张雪峰言论信息对高考报考的差异化影响。表 5 第(1)—(2)列显示, 在控制了各类固定效应和联合固定效应后, 经济活力较高的组别受到了更大的负面影响。

表 5 异质性效应: 经济活力差异与教育资源差异的影响

变量	(1)	(2)	(3)	(4)
	ln最低位次			
	高经济活力	低经济活力	教育资源多	教育资源少
新闻传播学类×2023	0.171*** (0.022)	0.133*** (0.019)	0.143*** (0.019)	0.156*** (0.02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各类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各类联合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89 092	96 842	83 185	102 749
R ²	0.930	0.940	0.933	0.938

注: *、**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中为生源地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从生源地的教育资源来看, 中国的高等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在各个地区之间的分布高度不均, 不同生源地优质高校的数量存在较大差异(刘海峰, 李木洲, 2012)。在优质教育资源相对较少的省份, 属地学生面临更大的竞争, 对于高考信息会有更大的关注度并且反应会更加强烈。因此, 优质教育资源较少的省份受到张雪峰事件的影响应该更大。为此, 本文统计了各省的双一流高校数量, 并利用该省 2023 年常住人口数进行人均化处理, 来衡量一个地区优质教育资源的丰富度, 将教育资源丰富度指标按照中位数分组后进行回归。表 5 第(3)—(4)列的结果表明, 张雪峰的言论更大程度上影响了属地教育资源匮乏的生源地的考生的决策。

由前文的分析可知, 张雪峰事件会对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录取造成负面冲击。前文从门类专业类的

层面出发，考察了新闻传播学类整体受到的冲击大小。而将新闻传播类拆分来看，其内部设有传播学、广告学、广播电视学、新闻学、编辑出版学、网络与新媒体、国际新闻与传播学、数字出版等8个具体专业，每个专业是否都受到了负向冲击、分别受到了多大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探讨。由于本文所使用的样本中只有一所大学招收“国际新闻与传播学”和“数字出版”专业，可能存在与其他专业系数不可比的情况，故本文只考虑分析其他6个专业。

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我们分别使用最低、最高两类位次指标对新闻传播学类中各专业与2023年的交乘项进行回归，并控制了各类固定效应及联合固定效应。第(1)—(2)列是最低录取位次的结果，发现新闻学和传播学专业受到的冲击更大。第(3)—(4)列是最高录取位次的回归结果，发现最高录取位次下降较多的是广播电视学、广告学、网络与新媒体专业，说明这些专业中优质生源流失较严重。由于编辑出版学是与“新闻”“传播”相关度最低的专业，所以显著性相比其他专业较弱，而其他所有专业都与新闻和传播关系紧密，都受到了较大的负面冲击。表6的结果进一步为验证张雪峰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提供了直接证据。

表 6 异质性效应：张雪峰事件对新闻传播学各专业录取情况的影响

变量	(1)	(2)	(3)	(4)
	ln最低位次		ln最高位次	
新闻学×2023	0.279*** (0.025)	0.270*** (0.024)	0.231*** (0.059)	0.225*** (0.060)
传播学×2023	0.260*** (0.034)	0.254*** (0.031)	0.263*** (0.043)	0.247*** (0.043)
广播电视学×2023	0.139*** (0.045)	0.140*** (0.045)	0.426*** (0.138)	0.437*** (0.140)
广告学×2023	0.219*** (0.031)	0.215*** (0.033)	0.303*** (0.059)	0.297*** (0.059)
网络与新媒体×2023	0.228*** (0.041)	0.220*** (0.040)	0.293*** (0.104)	0.289*** (0.099)
编辑出版学×2023	0.259** (0.097)	0.247** (0.095)	0.228** (0.103)	0.182* (0.10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各类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各类联合固定效应		是		是
N	169 363	169 363	52 532	52 532
R ²	0.908	0.909	0.900	0.902

注：*、**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为生源地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四）进一步讨论：非对称影响

张雪峰除了在直播和视频中提及了不推荐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外，也对其他的专业发表了一些评价言论。虽然张雪峰事件冲击中最鲜明的信息是张雪峰对于新闻学的负面言论，但随着事件关注度和讨论度的显著提升，他对其他报考专业的言论同样也会受到关注。关于这些专业评价的言论经过媒体加工与传播后，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张雪峰推荐的专业”言论，一类是“张雪峰不推荐的专业”言论。本文通过以下方式来确定传播意义上的“张雪峰推荐专业”与“张雪峰不推荐专业”：在微信公众号、抖音、B站、小红书等具有代表性的网络社交平台上对张雪峰专业评论的信息进行广泛检索，并将信息收集时间区间设定在2023年8月之前，选取出现频次最高的8个推荐的专业和8个不推荐的专业进行相关变量的设置^⑮。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探讨了张雪峰对于新闻学的不推荐言论对相关专业的录取产生的负面影响,为了进一步明确其“推荐”言论对相关专业的影响,下面使用张雪峰推荐专业作为处理组进行分析。表 7 中展示了将张雪峰推荐专业作为处理组,其他专业作为对照组的回归结果,其中,对照组中不包含不推荐专业。结果显示,推荐专业的录取情况确实存在一定的上升效应,但是系数相对较小。

表 7 张雪峰言论的非对称影响 I

变量	(1)	(2)	(3)	(4)
	ln最低位次	ln最低分	ln最高位次	ln最高分
推荐专业×2023	-0.087*** (0.013)	0.008*** (0.001)	-0.070*** (0.011)	0.006*** (0.00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各类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各类联合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153 001	153 001	59 774	59 797
R ²	0.932	0.907	0.925	0.930

注: *、**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中为生源地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然而,我们观察到,这些张雪峰推荐专业中包含了一些近年来广受欢迎的热门专业,因此,表 7 中的回归结果是否为张雪峰言论所导致的因果效应还需要经过平行趋势的检验。图 8 和图 9 中的结果也确实表明,由于推荐专业的趋势存在,平行检验难以通过。这说明表 7 中的回归系数无法反映出张雪峰言论对推荐专业所产生的影响,因此需要进一步对推荐专业的趋势进行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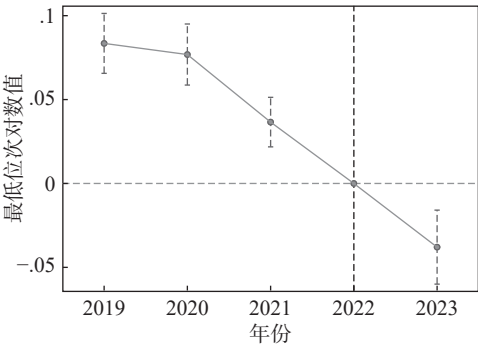


图 8 推荐专业平行趋势: 录取最低位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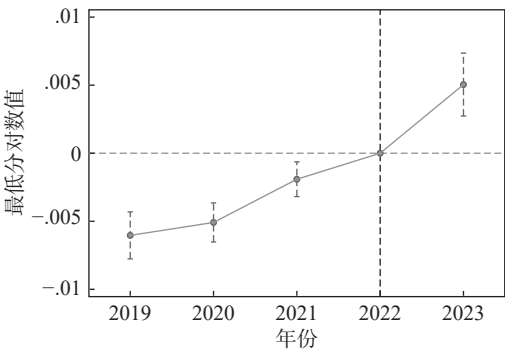


图 9 推荐专业平行趋势: 录取最低分

为了排除这种专业分组本身存在的趋势,我们在表 8 的回归中进一步加入了处理组趋势项和门类专业趋势项,以更准确识别张雪峰言论的因果效应(Moser & Voena, 2012)。第(1)—(2)列是对最低位次的影响,在加入趋势项之后,最低录取位次仅提升了 1.5% 至 2% 左右,并且显著性不强,说明张雪峰推荐专业并未产生较大的促进效应。第(3)—(4)列是对最低分的影响,回归系数表明,最低分仅提升了 0.3% 左右。第(5)—(8)是对最高位次和最高分的影响,结果与最低位次、最低分一致。表 8 的结果总体表明,张雪峰的言论对于其推荐专业的促进作用非常有限。

下面进一步将张雪峰推荐专业拆分为电子信息类、数学类、计算机类、法学类、中国语言文学类、统计学类、生物医学工程类、口腔医学类等 8 个门类专业类,探究张雪峰的言论对推荐专业的差异化影响,表 9 第(1)—(4)列分别为最低位次、最低分、最高位次和最高分的回归结果。由表 9 可知,只有电子信息类的录取位次和录取分数都有显著提升,而数学类和计算机类的录取分数虽然有所提升,但录取位次的结果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并且回归系数的绝对值都相对较小。其他专业则均未表现出显著

的上升效应。综上所述,张雪峰的言论对其推荐专业所产生的正面影响十分有限,仅对个别专业产生了小幅度的提升效应。

表 8 张雪峰言论的非对称影响 II

变量	(1)	(2)	(3)	(4)	(5)	(6)	(7)	(8)
	ln最低位次		ln最低分		ln最高位次		ln最高分	
推荐专业×2023	-0.015 (0.009)	-0.017* (0.009)	0.003*** (0.001)	0.003*** (0.001)	-0.013 (0.009)	-0.015 (0.009)	0.002*** (0.001)	0.002*** (0.00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各类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各类联合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处理组趋势	是		是		是		是	
门类专业趋势		是		是		是		是
N	153 001	153 001	153 001	153 001	59 774	59 774	59 797	59 797
R ²	0.932	0.933	0.907	0.908	0.925	0.927	0.930	0.931

注：*、**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为生源地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表 9 张雪峰事件对各推荐专业录取情况的影响

变量	(1)	(2)	(3)	(4)
	ln最低位次	ln最低分	ln最高位次	ln最高分
电子信息类×2023	-0.049*** (0.012)	0.006*** (0.001)	-0.060*** (0.014)	0.005*** (0.001)
数学类×2023	-0.016 (0.013)	0.004*** (0.001)	-0.016 (0.012)	0.002** (0.001)
计算机类×2023	-0.013 (0.011)	0.004*** (0.001)	-0.006 (0.013)	0.003*** (0.001)
法学类×2023	-0.025 (0.015)	0.002 (0.001)	-0.023 (0.021)	0.001 (0.001)
中国语言文学类×2023	0.007 (0.022)	0.000 (0.001)	0.055* (0.031)	-0.003 (0.002)
统计学类×2023	0.044 (0.026)	-0.001 (0.002)	0.000 (0.021)	0.001 (0.001)
生物医学工程类×2023	0.055 (0.071)	0.004 (0.005)	0.094 (0.090)	0.004 (0.005)
口腔医学类×2023	0.058* (0.030)	-0.000 (0.002)	0.140*** (0.049)	-0.002 (0.00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各类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各类联合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门类专业趋势	是	是	是	是
N	153 001	153 001	59 774	59 797
R ²	0.933	0.908	0.927	0.931

注：*、**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为生源地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五、结论及建议

(一) 研究结论

第一,2023年“张雪峰新闻学专业评论事件”对新闻传播学类的高考报录情况造成了负面影响,表

明自媒体的公共信号会对高考志愿报录情况产生显著影响。这一事件使新闻传播类最低录取位次平均下降了15%,该专业的录取最低分、录取最高分和录取最高位次也都出现了相应的下降。该事件的影响在各省表现出显著的分化:山东省的最低录取位次下降幅度超过30%,而吉林省、江西省、福建省等省份下降幅度则不超过5%。

第二,“张雪峰新闻学专业评论事件”所产生的效应依赖于自媒体的信息传播浓度,在信息传播浓度高的地区,高考志愿报录受到的影响更大。在短视频、直播观众密集度较高的地区,新闻传播学类的报录情况受到了更大的负面冲击。暴露在更多与张雪峰事件相关的新闻和资讯中的地区同样也受到了更大的负面影响。

第三,张雪峰“推荐”专业与“不推荐”专业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非对称性。张雪峰“不推荐”专业的录取位次大幅下降,但其“推荐”专业的上升效应较小。这一结果表明,公共信息在高考志愿报录过程中提升特定专业的吸引力的作用有限,相反,其主要功能在于帮助考生规避潜在的风险。

(二) 政策建议

第一,应注重对高考志愿填报相关公众人物言论的管理与规范。在自媒体时代,信息传播呈现出多向性、交互性的特征,其传播速度和影响范围都得到了显著提升。同时,信息的创作过程也更具有随意性与主观性,一些富含强烈情感色彩和尖锐观点的内容往往展现出更高的传播效率,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信息环境的复杂性,而且提高了信息发生扭曲与失真的可能性。因此,应着力提升高考志愿填报网络信息质量,进一步规范相关公众人物的言论。一是鼓励高考志愿填报相关公众人物持续提升自身的专业知识与业务水平,深刻把握最新的高考政策,深入分析高考志愿填报信息,提升其言论的客观性与真实性。二是规范高考志愿填报相关公众人物的公开言论,特别是对易引发舆情的过激、偏激性言论进行管理,避免进一步造成信息环境的混乱。三是引导高考志愿填报相关公众人物加强对不同考生情况的具体分析,避免发表过于笼统或随意的志愿填报评价。

第二,在高考志愿信息的传播环节中,应依据各地区不同的信息传播浓度实行差异化监管,进一步加强对信息传播的管理与规制力度。出于吸引关注度和盈利的目的,部分媒体在报道高考志愿相关信息的过程中存在夸大甚至扭曲事实的情况,易引发信息环境混乱,对考生的高考志愿填报行为造成干扰。由于各地区信息传播浓度存在显著差异,受到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因此,有必要依据各地的信息传播情况,对高考志愿信息传播进行差异化监管,提高信息传播规制力度,以保障高考志愿信息的健康传播和高考志愿填报的有秩序进行。一是提升高考志愿舆情的监控能力,采用机器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加强对网络传播内容的识别与分析能力,开发智能检测系统,对相关舆论进行实时监控,在信息传播浓度高的地区投入更多算力,保障舆论环境的健康有序。二是加强特殊时期监管力度,在高考招生的关键时期,市场对高考志愿信息的需求程度到达顶峰,供给方也会相应地加大相关信息的产出与传播力度,这种信息供给的突然增加会提高不实信息出现的可能性,因此,应加强监管与审查力度,尤其关注信息传播浓度较高地区的传播状况,保证高考志愿填报工作的顺利进行。三是加大监管处罚力度,对故意散播不实信息,使用过激语言煽动公众,对高考志愿填报正常流程造成严重干扰的机构或个人进行公开警告,必要时采取法律措施。

第三,培育参与主体多元化的高考志愿信息市场建设,营造不同信息供给主体之间充分竞争的 environment,打破信息壁垒和信息茧房,助力考生科学填报。由于高考志愿信息的相对稀缺性,考生会综合各种渠道来获取与整合信息,不同渠道的信息供给特征存在差异,导致对考生志愿选择的非对称影响。针对这种现象,应注重信息主体多元化的高考志愿信息市场建设,并出台相关监管制度,保障信息供给主体之间的充分竞争,形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局面。一是鼓励和支持各类信息供给主体提供更加丰富的高考志愿信息,提高政府和高校提供的志愿信息的全面性,鼓励自媒体在客观、公正、负责任的前

提下,对官方信息进行深刻解读并做出有益补充。二是维护高考志愿信息市场秩序,完善相关监管制度,加强监管力度,并建立实时评价与反馈机制,对扰乱市场秩序的信息予以及时清理。三是加强考生和家长与各类信息供给主体间的沟通与交流,通过咨询、宣讲会、论坛等形式促进多维度信息交流,提高考生和家长对高考志愿信息的综合获取能力,从而提升其填报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范子英工作邮箱: ivannj@163.com; 赵欣仪为本文通信作者: zhaozxy@126.com)

参考文献

- 鲍威,哈巍,闵维方,等.(2017)。“985工程”对中国高校国际学术影响力的驱动效应评估.《教育研究》,38(09),61—69.
- 程名望,张家平.(2019).互联网普及与城乡收入差距:理论与实证.《中国农村经济》,(02),19—41.
- 褚照锋.(2017).地方政府推进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建设的策略与反思——基于24个地区“双一流”政策文本的分析.《中国高教研究》,(08),50—55+67.
- 丁延庆,杜立珍,李伟,等.(2021).信息干预对高考志愿专业选择的影响——来自大规模随机实验的证据.《经济学(季刊)》,21(06),2239—2262.
- 高宪春.(2011).新媒介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研究新进路的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18(01),12—20+109.
- 郭丛斌,王天骄.(2021).学科评估参与和信息披露对本科生源质量的影响——基于2016—2020年全国高考录取数据的实证研究.《高等教育研究》,42(12),40—50.
- 哈巍,占雯燕.(2018)。“985工程”对高校本科生源的影响评估.《北京大学教育评论》,16(04),65—78.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3).教育部关于公布2022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2023年4月4日).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moe_1034/s4930/202304/t20230419_1056224.html.
- 金红昊,张文杰.(2021).新高考改革对各专业生源质量的影响分析——基于浙江省高考录取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国高教研究》,(10),74—80.
- 康乐,吴红斌,王维民.(2021).医学院校合并对其本科生源质量的影响.《中国高教研究》,(02),44—49.
- 李筱璐,吴宇川,丁延庆.(2024)。“双一流”建设动态调整对高校生源质量的影响——基于河南省高考录取数据的实证研究.《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06),83—95.
- 栗晓红,张莉娟.(2014)。“985工程”对高校本科生源质量的影响.《北京大学教育评论》,12(04),157—171+187—188.
- 刘海峰,李木洲.(2012).教育部直属高校应分布至所有省区.《高等教育研究》,33(12),17—25.
- 刘强.(2015).关于“211工程”“985工程”存废之争的思考.《高校教育管理》,9(03),90—93+119.
- 刘瑞明,焦豪,石阳.(2021).高校招生均等化政策改革与生源质量提升.《经济研究》,56(07),178—194.
- 刘三宝,李剑,罗小锋.(2022).网络招生宣传能改善专业“盲选”与“错选”吗?.《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02),87—97.
- 鲁元平,王军鹏.(2020).数字鸿沟还是信息福利——互联网使用对居民主观福利的影响.《经济动态》,(02),59—73.
- 马莉萍,卜尚聪,叶晓阳.(2021).新高考改革对“双一流”建设高校生源质量的影响——基于2014—2020年浙江省录取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国高教研究》,(01),32—39.
- 马志浩,葛进平.(2013).从流言到议题的网络舆论机制:社会化媒体语境下的网络议程融合探析.《国际新闻界》,35(07),16—25.
- 施炳展,金祥义.(2019).注意力配置、互联网搜索与国际贸易.《经济研究》,54(11),71—86.
- 隋岩.(2018).群体传播时代:信息生产方式的变革与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1),114—134+204—205.
- 王国华,李文娟.(2019).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网络媒体政策分析——基于2000—2018年的国家政策文本.《情报杂志》,38(09),90—98.
- 王金龙,郭志辉.(2021)。“双一流”政策对高校本科生源质量的影响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39(04),64—72.
- 王鹏,岑聪.(2022).市场一体化、信息可达性与产出效率的空间优化.《财贸经济》,(04),147—164.
- 王毅杰,李欣悦.(2024).购买确定性:高考家庭志愿填报的付费实践及其价值生成.《中国青年研究》,(05),110—118.
- 吴斌钟,钟笑寒.(2012).高考志愿填报机制与大学招生质量:一个基于择校机制理论的经验研究.《经济学(季刊)》,11(02),765—804.
- 吴宇川,丁延庆,许锐.(2023).更名能否提升本科高校的生源质量——基于河南省2015—2022年高考录取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国高教研究》,(05),32—39.
- 吴宇川,丁延庆.(2022)。“双一流”建设对本科专业生源质量的影响——基于山东省高考录取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国高教研究》(06),57—63.
- 许长青,梅国帅,周丽萍.(2018).教育公平与重点高校招生名额分配——基于国内39所“985”高校招生计划的实证研究.《教育与经济》,(02),10—17.

姚远,张帆,程诚.(2024).优绩主义的代价:家庭成就观如何影响青年互联网公益参与.《中国青年研究》,(07),48—56.

Bai, C. E., Chi, W., & Qian, X. Y. (2014). Do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cores predict undergraduate GPAs? A tale of two universities. *China Economic Review*, 30, 632—647.

Cohen, B. C. (1963). *The press and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3.

Duffy, J., & Fisher, E. O. N. (2005). Sunspots in the Laborato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5(3), 510—529.

Fehr, D., Heinemann, F., & Llorente-Saguer, A. (2019). The power of sunspots: An experimental analysi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03, 123—136.

Heinemann, F., & Moradi, H. (2018). Sunspots in global games: Theory and experiment. *Discussion Paper*.

McCombs, M. E., & Shaw, D. L. (1972). 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mass media.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6(2), 176—187.

Morris, S., & Shin, H. S. (2002). Social value of public inform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2,92(5), 1521—1534.

Mortensen, D. T. (1986). Job search and labor market analysis.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2, 849—919.

Moser, P., & Voena, A. (2012). Compulsory licensing: Evidence from the trading with the enemy ac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2(1), 396—427.

Wiswall, M., & Zafar, B. (2015). Determinants of college major choice: Identification using an information experiment.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2(2), 791—824.

注 释:

①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见 <http://www.stats.gov.cn>。

② 微信月活用户数量来源于腾讯控股发布的2024年第一季度的财务报告,抖音月活用户数来源于Quest Mobile中国移动互联网数据库截至2023年9月的统计。

③ 本文提到的位次下降是与第1位次相比,因此位次下降等同于位次绝对值增加。

④ “张雪峰信息”即张雪峰高考志愿填报信息的简称,下同。

⑤ 张雪峰对一些专业的评论是在回应特定考生的背景下提出的。然而,这些评论在传播过程中经过了重新加工和解读,结果在网络上形成了众多关于张雪峰推荐或不推荐专业的名单和分析。

⑥ 90所高校名单为:北京理工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辽宁大学、太原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东北农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大学、东北大学、上海海洋大学、苏州大学、河海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国药科大学、福州大学、南昌大学、郑州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湘潭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成都理工大学、四川农业大学、贵州大学、西北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天津工业大学、北京体育大学、兰州大学、宁夏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西南石油大学、合肥工业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中国传媒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华北电力大学、东华大学、山东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化工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新疆大学、石河子大学、东北林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山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安徽大学、宁波大学、河南大学、南京邮电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青海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内蒙古大学、吉林大学、延边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江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河北工业大学、大连海事大学、山西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天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广州医科大学。新疆、西藏、青海因数据缺失严重不纳入回归。

⑦ 如哲学类、经济学类、财政学类、金融学类、经济与贸易类、法学类、政治学类等。

⑧ 如哲学类下设具体专业哲学专业、逻辑学专业、宗教学专业、伦理学专业等。

⑨ 这种专业层级的不同可部分归因于录取机制的不同。具体而言,某些学校或学科采用大类招生的方式进行招生,有些则基于具体专业招生,导致录取数据在专业上表现出层级不一致的特点。

⑩ 在全部93个门类专业类中,除体育和艺术类的招生专业外共有87个门类专业类,本文的样本中包含除交叉工程类外的其他所有86个门类专业类。

⑪ 鉴于数据可得性,我们收集的是2024年6月份的各省份张雪峰观众占比指标。

⑫ 数据来源于各省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⑬ 限于数据可得性，抖音用户占比数据来自于2020年末巨量算数报告。

⑭ 数据来源：百度指数官方平台，见 <https://index.baidu.com/v2/index.html#/>。

⑮ 其中，推荐专业包含法学类、中国语言文学类、计算机类、数学类、统计学类、生物医学工程类、口腔医学类和电子信息类等，不推荐专业包含新闻传播学类、土木类、建筑类、外国语言文学类、电子商务类、哲学类、金融学类、经济学类等。

（责任编辑 童想文）

The Public Signal of We Media and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Will-Decision Application: A Study Based on “Zhang Xuefeng Journalism Event”

Fan Ziying Zhao Xinyi Wei Jiayu

(School of Public Economics and Administr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 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 will-decision application is a key part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and it is also a major decision that affects every candidate, and the rational decision of individuals depends on the acquisition of real information. In this paper, we studied the impact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on the 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 will-decision application in the era of “We Media”. We manually collected and organized the admission data of 90 “Double World-Clas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each province and each major from 2019 to 2023, and converted them into comparable admission ranks by matching a one-point-one-paragraph table and then systematically evaluate the admission rank. Based on the “Zhang Xuefeng journalism major review event” in 2023, we systematically assessed the public signaling effect of We Media. Based on the scientific and detailed quantitative analysis, we found that, first, the event caused the lowest admission rank i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o drop by 15% on average, and this situation showed great differentiation in each province. For example, the decline in Shandong province is more than 30% and less than 5% in Fujian province. Second, the effect depends on the concentration of news dissemination in the We Media and the more short-video users in the region, the greater the impact. Finally, the effect shows an obvious asymmetry. The “non-recommended” majors have a significant decline in the acceptance rank, while the “recommended” majors have little significant increase. “Recommended” majors do not rise significantly, indicating that the main role played by public information in the 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 will-decision application is risk aversion. Therefore, the management of public figures' statements related to college entrance exam will-decision applicat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 differentiated information supervision strategy should be implemented according to regions, and the market competition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 will-decision application information should be promoted to diversify it, in order to scientifically guide students in filling out their college entrance exam will-decision application.

Keywords: we media; 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 will-decision application; Zhang Xuefeng journalism event